

de amicitia legendo di riza  
in riza di alto sino a basso

# 西方汉学 十六讲

Genovese Costa in Roma.

Alto proemio il ritornare  
na maari all'esser piena e uterina  
quando si nomina alcuna cosa alle g  
al fare bono e si pone sopra nel spine  
riza risponde quasi alle nostre letter  
este de loro ad lazo o in un di c

主 编 张西平  
副主编 李雪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目 录

绪论	.....	I
第一讲	西方汉学研究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10
	第三节 学术意义	22
第二讲	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	30
	第一节 希腊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0
	第二节 罗马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2
	第三节 中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5
	第四节 《马可·波罗游记》	41
第三讲	葡萄牙汉学的发展	50
	第一节 葡萄牙早期的游记汉学	50
	第二节 耶稣会来华后的葡萄牙汉学	61
	第三节 近代以来的葡萄牙汉学	70
	第四节 当代的葡萄牙汉学	75
第四讲	西班牙汉学的发展	79
	第一节 16—18世纪西班牙汉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80

## 西方汉学十六讲

	第二节	18—19 世纪西班牙汉学研究的衰落时期·····	113
	第三节	20 世纪的西班牙汉学（中国学）研究与当代汉语教学·····	114
第五讲		意大利汉学的发展·····	119
	第一节	早期游记汉学时代·····	119
	第二节	意大利早期传教士汉学·····	120
	第三节	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兴起与发展·····	135
第六讲		德国汉学的发展·····	146
	第一节	17—18 世纪的德国汉学·····	146
	第二节	19 世纪德国汉学的发展·····	152
	第三节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发展·····	163
	第四节	战后德国汉学的重建与中国学的展开·····	171
第七讲		法国汉学的发展·····	187
	第一节	18 世纪法国的传教士汉学·····	187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诞生·····	190
	第三节	20 世纪至今的法国汉学·····	207
第八讲		荷兰汉学的发展·····	218
	第一节	荷兰汉学的缘起和特点·····	218
	第二节	早期荷兰主要汉学家·····	220
	第三节	20 世纪的荷兰汉学研究群体·····	224
	第四节	《通报》——荷兰及欧美汉学研究的重要载体·····	237
第九讲		英国汉学的发展·····	239
	第一节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末的英国汉学·····	240
	第二节	18 世纪初至 19 世纪初的英国汉学·····	243
	第三节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英国汉学·····	244
	第四节	20 世纪初的英国汉学·····	252
	第五节	20 世纪初期至今的英国汉学·····	254

第十讲	瑞典汉学的发展	274
	第一节 瑞典汉学的萌芽时期	274
	第二节 瑞典专业汉学的诞生与发展	277
	第三节 当代的瑞典汉学研究	281
	第四节 瑞典的主要汉学家及其成就	285
第十一讲	波兰汉学的发展	297
	第一节 波兰汉学的发端	298
	第二节 20 世纪的波兰汉学	304
第十二讲	捷克汉学的发展	312
	第一节 捷克汉学历史述略	312
	第二节 捷克主要的汉学家及其主要成果	316
第十三讲	罗马尼亚汉学的发展	322
	第一节 罗马尼亚早期汉学的萌芽	323
	第二节 1949 年以后的汉语教育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327
	第三节 罗马尼亚当今主要汉学家及其成果	331
第十四讲	俄罗斯汉学的发展	341
	第一节 初识中国的 17 世纪俄罗斯	341
	第二节 积累与萌动阶段的 18 世纪俄罗斯汉学	342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 19 世纪俄罗斯汉学	348
	第四节 专业化时期的 20 世纪俄罗斯汉学	363
第十五讲	美国汉学的发展	375
	第一节 以传教士为主的汉学研究时期 (1830—1920)	375
	第二节 以专业学者为主的中国研究时期 (1920 年以后)	384
	第三节 两位代表性的汉学家	390
	第四节 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新发展	399

## 西方汉学十六讲

第十六讲 澳大利亚汉学的发展 .....	403
第一节 澳大利亚汉学的起步 .....	403
第二节 澳大利亚中国学的初步确立 .....	408
第三节 澳大利亚中国学的繁荣 .....	414
第四节 澳大利亚中国学的继续发展 .....	420
后记 .....	427
人名译名对照表 .....	429

# 绪论

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海外汉学（中国学）<sup>①</sup>这个发生在国外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但真正对其展开学术性的研究则起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本书仅仅限定在对西方汉学<sup>②</sup>研究的范围内。

对西方汉学的研究是一个跨国别、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交叉性研究领域。我们先看跨国别，这个学科虽然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其研究对象，但研究者并不在北京或上海，而是在欧洲或美洲，他们是一群生活在巴黎、纽约或罗马的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这是一门发生在万里之外的关于我们中国的学问。中国历史几千年绵延不绝，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五彩斑斓，这些汉学家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选择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因此，国外汉学家的学问所及如同中国历史文化—样丰富多彩，它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知识和学问。显然，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从总体来把握这些汉学家的学术成就，这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跨语言是很自然的，这些对孔子、庄子进行深入的著作都是用西方的语言文字写成的，没有外语阅读能力，仅靠中文译本很难真正进入汉学研究的领域。因为，无论是这些汉学家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还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依托的理论都是西方的，解释的思路也都是西方的。有些在中国学术界看来十分奇怪的观点，其实有它自身的文化逻辑，我们只有从跨文化的角度才能对此加以解释。

在全球化的时代，知识的生产和思想的流动已经打破了固定的国家疆域，海外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自身的学问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事业，无论你怎么评价，

---

① 对域外的中国研究称“海外汉学”还是“海外中国学”，中国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一律称“海外汉学”，但认为“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可以通用。具体论述见本书第一讲。

② 这里所指的“西方汉学”是在欧洲语言和文化影响下的汉学研究。在地域上，除了欧洲之外，还包括北美的美国和澳洲的澳大利亚。

回避它已经不再可能。在今天想推进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眼睛仅仅盯住北京和上海已经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远在巴黎和纽约的同行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熟悉他们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传承，掌握他们的学术特点和文化背景，这样我们才能平等地同他们展开讨论与研究，同他们展开争论与合作。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今天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近代学术的产生是与西方汉学互动的结果。因为，当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时，中国的士人们还完全不会用近代的学科概念进行研究，基本还不太知道近代学科体系的分类和特点，而此时西方汉学已经诞生了近百年。1814年当雷慕沙出任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任汉学教授时，西方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已经开始进入西方的近代学术体系。他们已经开始用近代学术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和历史，而此时，中国学术本身仍处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之下，尚未进入近代的学术研究体系。但当时的西方汉学并不是远在天边，许多汉学家来到中国，并同中国学者展开了合作与讨论，这催生了中国学术的转变。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任教于厦门大学，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曾说：“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这说明了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 Sinologists or Sinolog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

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

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偈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 206 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 300 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sup>①</sup> 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这说明，中国在自身学术的建设和发展上和西方汉学有着内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了解西方汉学的历史与厘清我们自己的近代学术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中国在崛起，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个在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必须同时在文化上强大。在历经百年耻辱之后重新崛起的中国，需要在世界，尤其在西方重塑自己的文化形象。中国文化作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文明，有着它独有的魅力，它同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一样，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今天中国作为后现代化的国家，其成功的历程和经验同样有着世界性的意义。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是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新的历史使命。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各国的汉学家是我们最好的盟友，他们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了解西方汉学，掌握西方汉学的历史，学习西方汉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平等地同西方汉学家展开学术合作，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伟大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本教材首先从总体上介绍了西方汉学的特点，然后按照国家分别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汉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本书是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本专治西方汉学历史的教科书，希望读者由此进入西方汉学研究的大门。

<sup>①</sup> 《胡适文存》第 3 卷，亚东图书馆，1924 年版，第 203—205 页。

# 第一讲 西方汉学研究导论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进展之一。<sup>①</sup> 本书将对西方汉学的历史和现状作初步的研究，在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汉学历史和现状展开研究之前，本章首先对西方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加以论述。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我们在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称谓问题。

### 一、关于汉学

在汉语的传统中，“汉学”指的是与注重义理的宋代理学相区别的，发扬汉代经学

---

<sup>①</sup> 20 世纪最早开启这一研究领域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越生先生，他所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早的出版物。1991 年张良春主编的《国外中国学研究》，1995 年任继愈先生所主编的《国际汉学》和 1996 年阎纯德先生所主编的《汉学研究》，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参阅任大援，《80 年代以来国内汉学出版物一瞥》，载《世界汉学》第 1 期，1998 年。

中重训诂、考据、版本的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刘师培写有《近代汉学变迁论》，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述了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变迁，说明了“汉学”兴起的原因、过程和主要人物基本的学术主张。长期以来“宋汉轮回”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宋学”重义理，“汉学”重考据。<sup>①</sup>其实“宋学”和“汉学”是一对不可分的概念，近来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对宋明理学和清乾嘉学派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之间有种相互联系的“内在的理路”，这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朱熹那里“尊德性”和“道问学”是同时存在的，但后来在陆九渊、王阳明那里不再重视“道问学”，而把“尊德性”发展到了极致。即便这样，在双方的论战中，都需要回到原典，如王阳明为替他的良知说找到根据，就要重定《大学古本》，因此，知识论的传统并未断绝。清代的学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们一方面全面整理儒家的典籍，另一方面做思想的还原，找出儒家观念的原始意义。

这样以“尊德性”为其特征的“宋学”和以“道问学”为其特征的“汉学”在思想史意义上的关系并不像我们以往理解的那样僵硬。同时，这也揭示出在汉语里原本的“汉学”概念有两层含义：在狭义上指的是“清代以训诂、考据为其学术追求的乾嘉学派”，<sup>②</sup>在广义上指的是整个中国的学术。<sup>③</sup>正如柳存仁先生所说：“汉学要包括义理，就是哲学史、思想史这些学问，是顺理成章的事。”<sup>④</sup>“汉学”有了这两层含义，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汉学研究》和《汉学研究通讯》，以及中国大陆出版的《清华汉学》都是从广义上来理解“汉学”这个概念的。

在西方语言的传统中“Sinology”这个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西方最早设立的关于汉学研究的教席，是法国法兰西学院1814年12月11日正式设立的“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Une chaire de langues et de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sup>⑤</sup>“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决定性意义”。<sup>⑥</sup>但此

---

① 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载朱维铮，《求索真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汉学”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与“蕃学”相对，历史上，西夏在中央设有“蕃学”和“汉学”，这里的“汉学”是指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称谓。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③ 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④ 柳存仁，《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载林徐典主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⑤ 罗芘、冯裳、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

⑥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戴任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时在法文中并未出现“Sinologie”，在英文中更没有“Sinology”。法文中第一次出现“Sinologie”这个词是一个叫 L.A.M. Bourgeat 的人 1814 年在 *Mercure étranger*（《外星》）第三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L’histoire de la sinologie*（汉学史）’的文章中，<sup>①</sup>但这个词直到 1878 年才正式进入法语词典中。<sup>②</sup>英语中的 Sinology 显然是来自法语，有人认为它进入英语词典的时间是 1882 年。<sup>③</sup>欧洲著名汉学家傅海波认为用“ologies”这样的词缀来表示学科或研究领域是 19 世纪后的事，在英语里“Sinology”是很年轻的词，“第一次见于 1838 年，不久，再次见于 1857 年，……把‘汉学’解释为‘研究中国的事物’已是晚近之事，直到 1882 年才开始。因此可以说，直到 1860—1880 年间，希腊文和拉丁文杂交的‘汉学’一词才转化为通常意义上的词汇。这个时期，中国研究和中国本身才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学术上一个专门的课题。”<sup>④</sup>但也有学者认为有时人们也把它写成“Sinologue”，实际上欧洲的汉学家们现在有时还这样写。<sup>⑤</sup>

傅海波所说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杂交的“Sinology”是说词根“Sin”是希腊文，词缀“ology”是拉丁文，意思是学科。日本学者认为“‘Sin’、‘Sinai’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 ts’in（通俗的 chin）而来的。这一音中否认 ch 的发音是由不发 ch 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 Sin、Thin 的发音，更进一步形成了 Sinae、Thinae 的发音”。<sup>⑥</sup>

尽管对“Sinology”词源学上出现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界对它的内涵认识大体是一致的：Sinology 指的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语言、文明、历史的研究。在西方早期汉学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参与其中，早期来华耶稣会会士的中文汉学著作，有相当多的部分是由中国的士大夫们帮忙润色，乃至合作而成的。但在欧洲汉学作为一个

① *Tresor de la Langue Francaise*, v. 15 (Gallimard, 1992), p. 540, 转引自尹文娟,《〈中国丛报〉与 19 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

② 参阅尹文娟,《〈中国丛报〉与 19 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

③ 参阅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 1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538. 及尹文娟《〈中国丛报〉与 19 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

④ [德]傅海波著,胡志宏译,《欧洲汉学史简评》,载《国际汉学》第 7 辑,大象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1 页。

⑤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2001), p. xi. 在来华传教士所创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第一卷中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称为“Chinese Scholar”, 1838 年第一次出现了“Sinologue”, 在 1849 年 18 卷 8 月号上刊登西方第一个汉学书目《关于中国的著述》(*List of Works upon China*) 中也出现了这个词, 尹文娟认为 Sinologue 这个词是在 1849 年《中国丛报》发表汉学书目到 1851 年《中国丛报》停刊, 在此期间逐步固定下来的。参阅尹文娟,《〈中国丛报〉与 19 世纪西方汉学研究》抽样本。

⑥ 刘正,《海外汉学研究: 汉学在 20 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7 页。

学科诞生后，Sinology 就是专指由非中国人参与的西方人自己的一种关于中国语言、文明、历史的学问。至于在当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开始在西方的汉学系中任教、著书，那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一现象并不能改变 Sinology 的基本含义。<sup>①</sup>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何时开始将“Sinology”称为“汉学”的呢？《汉语大词典》在解释时说：“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为汉学。清俞樾《茶香室丛钞·记日本国人语》：‘日本之讲汉学，自伊藤仁斋始。’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七：‘东来传教士及欧洲本土学者，相携并进，至 19 世纪，汉学（Sinology）于焉确立。’”<sup>②</sup>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如何称谓日本对中国语言、文明、历史的研究的学问；二是谁首先将 Sinology 转换成汉语的“汉学”概念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在江户时期是日本的传统汉学时期，日本近代文化产生以后，传统的汉学就已经终结，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开始形成。<sup>③</sup>实际上不仅是在日本，在整个东亚，对“汉学”的理解与解释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含义。“在接触中华文明较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汉学’在许多场合是儒学的代名词，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全部。在这些国家，‘汉学’与其本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长盛不衰，不仅是某些国家（如日本、越南等）某一历史阶段学术研究的全部，也是某一历史阶段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学说。”<sup>④</sup>

第一个将“Sinology”翻译成“汉学”的可能是王韬，王韬在他的《法国儒莲传》一书中将儒莲的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翻译成《汉学指南》<sup>⑤</sup>，近来研究者指出：“该书的中文名称应该是《汉文指南》，译成‘汉学’显然是王韬之误。不过从王韬所译的‘汉学’一词中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法国的‘Sinology’所代表的欧洲的中国研究。”<sup>⑥</sup>接着应是朱滋萃，在他所翻译的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中将“Sinology”翻译为汉学。而后是 1943 年出版的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一书，也将“Sinology”翻译成“汉学”。此书是国人所写的第一本西方汉学史，虽然书中多引用石田干之助的《欧人汉学之研究》一书，但也有自己的贡献。

在用“汉学”来表达“Sinology”时，“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的一切研究

① 孟华，《汉学与比较文学》，载《国际汉学》第 9 辑，大象出版社，2003 年版。

② 《汉语大词典》（中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404 页。

③ 严绍溥，《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版。

④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 2 页。

⑤ 王韬，《弢园文录补编》，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⑥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 11 页。

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探讨。”<sup>①</sup>余英时先生认为“我们用汉语中‘汉学’一词来翻译‘Sinology’不但取义过狭，而且也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汉族中心论’的偏见。”<sup>②</sup>所以，这里的“汉学”既不是指乾嘉考据学派，也不是单指汉族一族，或汉代一代之学问，而只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

## 二、关于中国学

将英文中“Chinese Studies”翻译成“中国研究”或“中国学”起源何时，谁第一个使用这个汉语概念，尚待研究。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梳理美国汉学的历史入手。

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源于传教士来华，1830年2月25日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到达广州，揭开了中美关系史和美国汉学史。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前后发行了20年，它不仅成为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了解中国的窗口，也成为当时欧美汉学界汉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成为美国汉学的摇篮。1848年《中国丛报》后来的主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出版了他的代表性汉学著作《中国总论》，1876年卫三畏返回美国后在耶鲁大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汉学系。这个时期的美国汉学虽然在对中国研究的方法和关注的重点上与18世纪前的来华耶稣会士有很大不同，但仍在传统汉学研究的范围之内。

“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最终使中国学研究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从古典研究规范中分离出来。应当说，这种分离是一个过程，它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简称IPR）的成立。太平洋学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学术转向标志的学术团体。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字、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sup>③</sup>

① 余英时，《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载《世界汉学》第1期，1998年，第190页。

② 同上。

③ 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实际上，此时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的汉学家移居到美国生活，他们带去了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这说明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和欧洲的汉学研究之间并不是截然分明、毫无联系的两科学术传统，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结，而又逐步分化的过程。参阅柯马丁（Martin Kern），《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载张西平、李雪涛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美国汉学的历史我们在下面还有专门的章节研究，这里，我们只列出不同于传统汉学研究的“中国学”产生的几个要点：

第一，西方现代中国学诞生于美国。

第二，美国现代中国学起始于太平洋学会的成立，完成于1941年远东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Far Eastern Studies）。<sup>①</sup>

第三，美国现代中国学产生于太平洋战争，是应美国的国家需要所产生的，正像当年西方传统的汉学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与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在远东的扩张而诞生一样，美国的现代中国学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研究”。<sup>②</sup>

第四，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和传统汉学研究，在方法上的重要区别是打破了传统汉学研究局限于文献、语言研究的狭小范围，把传统的汉学研究置于地区研究的框架之下，“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sup>③</sup>正如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所说，“在哈佛进行对中国的分区研究（即地区研究——编者注）计划的结果：这一分区研究法运用了每一种社会科学，并使我自1936年以来在哈佛教的中国史能条分缕析”。<sup>④</sup>

### 三、关于国学

国学指的是中国本土固有的学问。国学这个词很古老，在《礼记·学记》中就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但这个概念真正开始广泛使用是在清末民初。1902年秋天，梁启超在日本谋划创办《国学报》，<sup>⑤</sup>不过梁启超办《国学报》的目的在于批判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振兴“国学”。当时，西学兴盛，中国本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为捍卫本国固有学术文化思潮，这一时期在民间成立了很多国学研习组织，如章太炎在东京兴办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1911年在北京、1914年在日本，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国学丛刊》；1914年在东京、北京，陈尔锡、吕学沅等人创办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1923年1月，北京大学胡适等人创办的《国学季刊》

---

① 1956年该学会更名为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出版《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② [日]安藤彦太郎，《日本研究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③ 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④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前言第3页。参阅朱政慧，《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讨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⑤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

杂志等。胡适在他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要从三方面来推进国学研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还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sup>①</sup>

像前面我们所讲的，在广义上汉学指的是整个中国的学术。因此，也有学者将“汉学”和“国学”等同，<sup>②</sup>如将香港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称为“汉学大师”。但自20世纪80年代，将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称为“汉学”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中国人研究本土的学问称为“汉学”，当然，坚持“国学”和“汉学”等同的观点仍在，如台湾的《汉学研究》杂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汉学”与“国学”的。

从理论上讲，因为 Sinology 所研究的客体对象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诸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考古、艺术等，“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中国人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Sinology’的学术成果，大多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sup>③</sup>所以，“海外汉学”与“国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必须厘清“汉学”与“国学”的联系与区别。

#### 四、结论

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重视外国人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认真梳理和分析，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外国人对我们研究的再研究。如何称谓这样一种研究呢？

第一种意见认为，用“汉学”称谓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种意见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他说：“‘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些学者主张把‘Sinology’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一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较为方便。‘汉学’的‘汉’是用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 Sinology 的语根 Sino- 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这是希望读者注意的。”<sup>④</sup>

① 胡适，《发刊宣言》，载《胡适文存二集》，第一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②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词的使用范围本没有国别的界限。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是汉学，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也是汉学，因此，有人主张把中国人讲的‘国学’就译作 Sinology”，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 严绍溟，《汉学，本土文化的一翼》，载《汉学研究》第七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 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这里，李学勤先生将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称为“汉学”，并对“汉”字作了明确的限定。任继愈先生也持这种观点。<sup>①</sup>为了与国内的“国学研究”相区别，用“国际汉学”、“海外汉学”来加以限定，阎纯德先生认为“最好把‘国际汉学’、‘海外汉学’统称为‘汉学’，‘国内汉学’称为‘国学’”。<sup>②</sup>

第二种意见认为，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中国学”，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学科的奠基者孙越生先生，他所主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就是这个理解的产物。<sup>③</sup>朱政慧认为“传统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研究统称为中国学”，<sup>④</sup>何培忠也对这样的认识有十分清楚的表述，他说：“由于如今国外‘中国学’不仅有关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环境等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也有传统汉学高度重视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学’是传统‘汉学’在现代的延伸和发展。而使用‘中国学’这一称谓，不仅可以包容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使人对历史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现代的中国有更好的理解。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我国学术界也应跟上时代的变化，将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中国学’。”<sup>⑤</sup>

第三种意见以严绍溟先生为代表，他说：“我以为关于对‘Sinology’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有一个历史事件的区分概念，例如把欧美日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在各国的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展开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或许会更接近于他们的研究特征的实际。至于说‘Chinese Studies’，那是另一类的研究，即‘现代中国的研究’，它们或许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如当代政治、当代经济等），而不是我们所十分注目的经典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sup>⑥</sup>

严先生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和较早做美国中国学的侯且岸先生接近，侯且岸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汉学和中国学相互连接，而又有区别：以传统人文学科进行研究的为汉学，以地域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研究为中国学。<sup>⑦</sup>严

---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国际汉学》第8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阎纯德，《我看汉学和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四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孙越生在《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前言中明确指出，应将“Sinology”的翻译从“汉学”改为“中国学”，载《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

④ 朱政慧，《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思考》，载朱政慧，《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⑤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⑥ 严绍溟，《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国际汉学》第5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⑦ 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载《国际汉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的不同，其关键在于他所讲的“中国学”只是“Sinology”，而朱政慧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学包含了“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两部分。

本书的观点是：国外对历史中国之研究，我们称为“汉学”，或者说国外对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的研究，我们称为“汉学”（Sinology）；国外对当代中国之研究，我们称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

这里我们作两点说明：

第一，国外对传统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在不同时代的确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研究的对象并未变化，他们在治学的路数上都有勾连，所以统称为汉学，便于我们对其把握；这里我们所用的“汉学”已经和西方人讲的 Sinology 有所不同，他们所理解的汉学只是一种历史形态，在他们看来，今天西方那些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学问，因研究方法的改变而改称为“中国学”，而在我们看来，只要研究的是历史中国，只要以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为对象，不论过去还是今天，都称为“汉学”。所以，我们说的“汉学”是按其研究的对象划分的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形态。我们认为，这里所称的“汉学”才是真正的、原来意义上的 Sinology。

第二，我们所以不用“中国学”来统称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是因为这个无所不包的关于中国的学问，从根本上无法把握。应根据其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加以把握，将“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限定在国外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既符合其原意，也有利于在国内对其系统的研究。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国外对中国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研究机构日益增多，对海外这类研究的系统把握和反研究，非专业学科人员是无法进入的。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国学”和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并不完全相同，以费正清和柯文等人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历史中国的研究，只是在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方法上与传统汉学有所区别，我们统称国外汉学研究。相反，那些以现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为研究对象的，才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学”，这样的研究才能称为 Chinese Studies。

因此，这样一个表述是中国学术界对国外中国研究的重新理解，这样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追随西方学术中的“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概念以及在东亚各国学术传统的“汉学”和“中国学”的历史或现实的概念。

我们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立场，从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和国外对中国研究的长远发展来作这样的界定的，其基本和核心的学术根据是从研究对象来确定研究学科的称谓。

学术是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特别是在关于海外研究中国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个涉及中国所有知识和学术的称谓问题上，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是很正常的，为了对各种